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 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

——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孙立祥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中日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历史问题;民族和解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145-06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表明,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实现了两国间的政治和解,而远未实现民族心理和解。从复交以来中日关系屡生齟齬、磨擦不断的曲折演变轨迹来看,尤其从日本右翼势力对内采取酷似战前的恐怖手段迫害进步人士、对外在历史认识和钓鱼岛等问题上一再挑战我民族感情底线与核心利益底线的最新动向观之,笔者认为中日关系的前途不容乐观。因此如何在已有政治和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民族心理和解,便成为中日两国当下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亟待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对此予以探讨当有裨益。

一、影响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

(一)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

战后以来,日德两国政要对相同的侵略历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战争性质和侵略罪行的认识不同。在德国,既有将德国战败日(5月8日)定为“德国人民解放日”的国会决议,也有赫尔佐克总统在波兰反法西斯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仪式上“请求宽恕”的谢罪讲话^{[1]307};既有勃兰特总理、科尔总理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犹太人纪念碑前猝然下跪的惊世之举,也有德国总统和总理规劝日本天皇和首相“必须铭记历史教训”^{[1]209}的谆谆告诫。而

* 收稿日期:2011-12-03

作者简介:孙立祥,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处理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11BDJ002),项目负责人:孙立祥。

在日本,裕仁天皇不仅在战后先后 8 次走进靖国神社向当年“皇军”将士的亡灵致敬,而且公然将靠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殖民地收益实现了日本工业化的“侵略之道”视为“治国之道”,甚至公然号召其臣民着手振兴“日本战前和战时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精神”^[2]——军国主义精神。至于日本首相和内阁僚,除细川护熙、村山富市对侵略历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外,其他政要则一有机会便就战争性质和侵略罪行两个焦点问题大放厥词、试图翻案,以至“失言”、“收回”、“辞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一大“景观”,甚至连田中角荣首相在中日复交谈判中一度说出“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成为问题的讲话^[3];在邦交正常化后的国会答辩中又一度声称“过去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我只能回答应由后代历史学家去评价”^[4]。

其次,历史教育导向不同。在德国,不仅魏茨泽克总统要求教师帮助学生牢记侵略历史、谢尔总统严肃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而且西德政府还与法国、波兰等被侵略国家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检验和评价。这对排除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和实现彼此民族心理和解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日本,自冷战伊始,日本右翼势力尤其右翼政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年轻一代重新引上军国主义歧途。结果,不仅进步学者家永三郎编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从 1963 年起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开始了“教科书案”漫长的诉讼历程,并最终以案永部分败诉而告终,而且时至今日已先后制造了 4 起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右翼政客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并加以错误诱导的短视行为,不但会在东亚地区埋下新的战争祸根,也势必使日本民族面临着再度付出沉重历史代价之虞。

再次,战争赔偿政策不同。自 1953 年“联邦补偿法”颁布到 1993 年 1 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 904.93 亿马克,计划到 2030 年再支付 317.72 亿马克,总数将多达 1 222.65 亿马克(约合 866 亿美元)。尤须注意的是,德国的战争赔款全部支付给了被侵略国家和民族,而未向本国入支付任何战争补偿金,其战争赔偿政策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制定过一部针对外国人的战争赔偿法案,相反自 1952 年起先后颁布和实施了《军人恩给法》等 10 余部针对本国人的战争补偿法律,而且其补偿额度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而不断递增。结果,日本政府迄今对外支付战争赔款仅为 6 166.8 亿日元(约合 70 亿美元),而其支付给本国 310 万死伤病旧军人(即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皇军”将士)及其遗族的战争补偿金总额已多达 37 兆日元(约合 4 214 亿美元)。至于那些战时受过“处分”的有良知的旧军人及其遗族,那些死伤病“台湾籍日本兵”和“朝鲜籍日本兵”及其遗族,那些死于非命的普通日本国民及其遗族等,均不在补偿范围^①。日本政府及其右翼政客推行的这一“内向型”战争补偿政策,明确向其国人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无论什么性质的战争,只要你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和“牺牲”,那么你就一定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肯定(参拜靖国神社)和物质上的丰厚补偿(提供战争补偿金)。这明显具有鼓励国人继续战争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影响,极易诱发下一次侵略战争,对此亚洲各国应保持高度警惕。

显而易见,日本政府及其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上述态度,无疑是阻碍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巨大障碍。因为政治家及其政治家集团是一国之“舵手”和民族的“领航员”。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拒不承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的政治领导集团,能够引领本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够与被侵略民族世代友好。因此,日本政要能否像德国政要那样言行一致正确对待侵略历史,是中日两国能否最终实现民族心理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

当年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确有部分觉醒了日本国民开展了一系列反战斗争,对人类战胜日本

^① 日本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战争赔偿政策及其成因》,《世界历史》2007 年第 1 期。

法西斯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也不可否认另一部分不觉悟的类似东史郎母亲那样的日本国民,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久远影响下,在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下,在近代史上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殖民地收益这一“利益”误区驱动下,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①,即这部分日本国民实是肩负着“受害者”(对日本统治阶级而言)与“加害者”(对被侵略国家人民而言)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这不禁令人想起对认识该问题极富启示意义的鲁迅先生留下的一段文字。他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5]当然,我们在研究日本国民与侵略战争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遵循将发动侵略战争的统治阶级与盲从侵略战争的普通国民区别开来、将盲从侵略战争的多数国民与进行反战斗争的少数国民区别开来等项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确保该问题研究的科学性和结论的准确性。

那么,战后60多年来日本国民是否全部走向觉醒即抱持正确的历史观了呢?答案是令人沮丧的。诸如,日本战败初期(1945年9月),《大公报》记者黎秀石在东京以普通日本民众(工人、农民、店员、学生等)为对象做了一次“世论调查”,题目是“你认为东条英机是民族英雄还是战争罪犯?”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民众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心声:东条算不上民族英雄,但也不是战争罪犯,他只是犯了“没准备好就打”^[6]的错误,结果战争失败了。旧金山会议后不久,部分日本国民还掀起了大规模的要求释放国内外在押战犯“国民运动”,仅1952年11月11日在东京两国旧国技馆召开的要求释放战犯集会,参加者就有1.3万人之众,而雪片般来自全国的3000万份要求释放战犯的“请愿书”,更是在主席台上堆积如山^[7],反映出当时部分日本国民不但不痛恨为害邻邦、祸国殃民的战犯,而且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他们的“崇敬”。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日本国民的这一错误的战争史观不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生成了浓厚的“受害”意识和可怕的复仇心理。当时将日本对华战争视为侵略战争的国民不足十分之一;中小学生们在看了《支那的怒吼》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省角度来欣赏,相反在观后感作文中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一个意愿:“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此仇必报!”^[8]日本国民的这样一种思想意识状况,就使得本多胜一等能够正确反省侵略历史的正直人士在受到右翼分子威胁的同时,还要时常忍受来自周围邻里和同事“非国民”、“亵渎英灵”一类的责骂。这与战时盲从战争的不觉悟的日本国民谩骂和围攻反战人士的情形何其相似,又与德国民众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和反对纳粹复活的言行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这些不觉悟民众的大量存在,既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蠢蠢欲动的社会基础,也是日本保守政权能够长期执政的“民意”基础。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日本国民不抛弃这一错误的历史观,那么中日关系彻底走出低谷和两国实现民族心理和解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日本的未来终究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把握。这就需要在颂扬日本人民反战斗争事迹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年部分日本国民盲从了侵略战争之史实。只有日本国民在汲取战时盲从战争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再盲从今天重新抬头的右翼势力,才能确保日本国沿着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前行而不是相反。

(三)中国尚未完全崛起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既需彼此抱持和解愿望,也需创造和具备和解条件。就中方而言,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就一再向日方表明了早日“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并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努力;中日复交谈判中,我国政府和领导人通过主动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权等,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与日本永修“秦晋之好”的决心,为此顺利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即政治和解;中日复

^① 据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他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应征入伍。临行前,母亲不仅亲手送给儿子一把锋利的匕首,以备“在战场上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就剖腹自杀”,而且说出“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这一冷酷无情的话,以鼓励儿子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参阅(日)《东史郎日记》,熊本出版文化会馆2001年版,第21页。

交后,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又一再向日方表明了“世代友好”的心愿,并始终恪守中日关系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未曾做过一件有碍两国友好的事情。可见,中方从不缺乏与日本实现民族心理和解的愿望。我们需要集中做的是努力创造和解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排除一切内外干扰如期达成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笔者将我国如期达成现代化既定目标作为实现中日民族心理和解重要条件的依据,主要有二:

一是缘于近代百余年的历史教训。对中国而言,1840年至1945年是充满血与火的一个世纪。此间,西方大小列强曾将一系列侵略战争和外交讹诈强加给中国。在中外百年对抗和屡屡交锋中,除抗日战争胜利外,以往历次民族解放战争均以中方失败而告终。而其中侵华元凶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支持袁世凯篡权、制造七七事变先后三次粗暴打断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悲惨历史,更深深留在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日本一再使中国痛失崛起机遇的痛苦记忆,不仅让我们懂得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更使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国家间是很难确立起平等外交关系的,即使暂时建立起对等的国家关系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更不要奢望民族心理和解了。日本右翼学者中村繁在一次演讲中抛出的谬论——“日本的战争责任时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9],则从反面提醒了我们避免再次挨打的惟一出路在哪里、实现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根本路径在哪里。

二是缘于日本统治阶级只信服实力和服膺强者的秉性。663年唐新(罗)联军大败日军于白村江口得以换来东亚900余年的和平,1597年明朝(鲜)联军大败日军于朝鲜半岛得以换来东亚300余年的和平,1945年中美英苏等盟军大败日军于亚太地区得以换来东亚60余年的和平,均系日本统治阶级只信服实力这一传统秉性使然;而日本政府所以在近代做出与英国结盟即“脱亚入欧”的外交抉择、在战后做出与美国结盟即“脱欧入美”的战略安排,日本朝野所以将逼使自己“开国”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将打败并占领本国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视作“英雄”和“恩人”而为之树碑立传^①,则是由日本统治阶级只服膺强者的一贯秉性使然。对此,正直的日本人自己已有深刻的认识。诸如,侵华老兵山冈繁反省道:日军所以“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是因为“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10]。日本知名人士寺岛实郎亦曾指出:20世纪的日本人,“对于强者,对于追求目标的潜在的自卑感,反过来就表现为对于弱者,对于自以为比自己落后者的浅薄的优越感”^[11]。这一秉性也是造成战后部分日本人只承认战争输给强大的美国而不承认败给落后的中国,进而导致中日关系屡生龃龉、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统治阶级的这一缺乏是非、只信服实力和服膺强者的秉性提示我们,未来数十年日本能否继“脱亚入欧”、“脱欧入美”之后做出“脱美归亚”的正确抉择,即能否与中国这个主要邻邦实现民族心理和解,同样取决于我国这一轮和平崛起目标能否如期达成,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实力能否提升到足以令日本政要信服的程度。否则,中日关系彻底走出低谷和两国实现民族心理和解便属奢望。

二、克服中日民族心理和解障碍的主要路径

就我方而言,宜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动中日两国早日实现民族心理和解。

(一)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部分日本国民走向觉醒

首先,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力争收到三个基本效果:第一,通过加大对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

^① 更有甚者,美国占领期间竟有50多万日本人致信麦克阿瑟元帅,卑躬屈膝地称“麦克阿瑟是父亲和神”,恳求“把日本当成美国的属国”;日本国会还通过了“感谢麦克阿瑟决议”,甚至有人提议给予麦克阿瑟“永久性的国宾待遇”、“建立麦克阿瑟纪念馆”等。直至“麦克阿瑟嘲讽说‘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赞美才一下子冷了下来”。——参见寺岛实郎著,徐静波、沈中琦译:《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侵华暴行的宣传力度,使日本国民尤其青少年明了,当年被处决的东条英机等各类战犯并不是本国的“民族英雄”,而是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历史罪人,从而自觉抵制今天本国右翼势力尤其右翼政客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和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第二,通过扩大对战时鹿地亘等反战人士英勇斗争事迹的颂扬,使日本国民尤其青少年明了,这些曾被骂做“非国民”、“卖国贼”的反战人士,才是当年拯救日本民族于毁灭的真正民族英雄,从而理解和声援今天类似本多胜一等正直人士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和同右翼势力的斗争。第三,还要力争通过宣传,使日本国民尤其青少年明了,日本当年的确通过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和残酷殖民掠夺完成了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实现了近代化,然而日本民族的这一所谓“社会进步”是建立在东亚其他民族巨大损害和痛苦基础上的,使之走出这一狭隘“利益”误区十分重要。其次,通过改变对日谈话基调和宣传口径,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笔者认为,应在正视部分日本国民战时盲从了侵略战争、战后仍未全部走向觉醒这一严酷事实的基础上,我国领导人在会见日本政要时,我国外宣部门在对日外交宣传时,宜改变以往“日本国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一笼统的谈话基调和宣传口径,而应代之以“日本人民既应发扬当年反战人士的优良斗争传统,也需认真总结和汲取过去盲从战争的沉痛历史教训”,这才符合历史真实,也才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否则,仅以“受害者”和“牺牲品”自居的日本国民就永远不会全部走向觉醒,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日本保守政权执政的“民意”基础就永远无法彻底铲除,中日两国最终实现民族心理和解也就势必遥遥无期。

(二)通过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影响和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依据,源于日本统治阶级“与最强者结盟”的外交传统和“恃强凌弱”的一贯秉性。大而观之,在古代特别是强汉盛唐时代,日本在虚心学习和吸收中华灿烂文明的同时,交好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原王朝侵略和欺凌朝鲜王国,甚至一度在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建立了一块古代殖民地;在近代,日本在虚心学习和吸收欧洲近代文明的同时,背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通过缔结日英同盟)疯狂侵略和掠夺中国等亚洲近邻,以致成为列强侵华的元凶;在当代,日本在虚心学习和吸收美国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背靠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一再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上挑战中、韩等近邻国家的民族感情底线与核心利益底线,甚至不惜成为“亚洲的孤儿”。日本上下两千年发迹和崛起的历史,是对日本统治阶级“与最强者结盟”外交传统和“恃强凌弱”秉性最好的诠释。小而言之,战后早期日本政府一贯唯美国马首是瞻,顽固奉行“亲美反华”政策,百般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然而,一旦其靠山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尼克松访华改变对华敌视政策而开始“美中接近”,它便毫不迟疑地紧随其后放弃了秉持20余年的“亲美反华”立场而开始“日中接近”,甚至抢在美国之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是中美接近影响和促进中日关系根本改善的绝好例证。可见,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日本改善关系最现实有效的途径,就在于充实和密切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笔者认为,应从三方面入手充实和密切中美关系:(1)在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蠢蠢欲动的当前背景下,加强中美两国并肩战胜日本法西斯历史的研究和宣传,增进中美民族感情和密切彼此高层交往。(2)在确保国家核心利益无虞的前提下,适当向美国倾斜开放市场,给务实的美国人看得到的实惠;同时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和支持美国政府在国际反恐等方面的政策。(3)要设法让美国朝野明了,曾经给美国造成建国以来最大灾难的、具有“既反共又反美”^[12]传统并已明显呈现新的反美迹象的日本右翼势力,已再度对美国的未来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进而敦促美国政府在汲取战前“绥靖终必害己”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东亚各民族一道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三)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

新世纪伊始,我国个别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抛出“搁置”历史问题的所谓对日外交“新思维”,一时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历史问题是关乎亚洲邻国民族感情的原则问题,也是关乎日本今后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绝不是一个可以主观“搁置”的问题。尽管经过数年争论和批评“搁置

论”已日渐式微,但笔者认为,一方面仍需努力消除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同时必须提防走向另一个极端——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新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反华行径,尤其小泉首相挑战我民族感情底线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和菅直人政府挑战我核心利益底线制造钓鱼岛争端的行径,已将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愤慨推向极端。这就需要国人尤其广大青年务必将满腔爱国热情自制于理性爱国的范畴内,通过使个人言行与国家长远战略部署协调一致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会因个人言行与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相左而使我核心利益无谓受损。这就要求我们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起事端的新形势下,坚决贯彻中央“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一方面继续与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关系的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自乱方寸和自毁国家稳定大局。否则,就正中了对通过引发中国内乱来遏制我新一轮崛起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四)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党和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能否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伟大复兴,关键取决于能否持续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和营造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良好周边安全环境。显而易见,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发达国家日本无疑是重要的邻邦;在中外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具有战略意义。然而,进入新世纪十余年来中日关系两次跌入低谷的堪忧现状,显然不利于我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如果这一令人忧虑的状况不尽快予以改善,势必迟滞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出人意料地呈现如此堪忧的局面,既与日本朝野右翼长期阻挠和破坏这一人为的因素密不可分,也与中日两国存在民族差异、文化差别等客观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建议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和民族安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组织学界一流专家学者就上下两千年中日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纵向梳理和全面总结,分期分批推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权威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最终实现中日民族心理和解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黄永祥. 不要忘记德国[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 [2] 肖季文. 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6.
- [3] (日)日中国交回復促進連盟. 日中国交回復関係資料集[M]. 東京:日中国交資料委員会,1974:1.
- [4] (日)四国教区靖国問題特別委員会編集委員会. 靖国問題学習資料集[M]. 東京:万成社,1996:470.
- [5] 鲁迅. 鲁迅选集(1)[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64.
- [6] 黎秀石. 见证日本投降[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93.
- [7] (日)吉田裕. 日本人の戦争観[M]. 東京:岩波書店,1995:82.
- [8] (日)岩崎昶. 日本电影史[M]. 钟理,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244.
- [9] (日)歴史検討委員会. 大東亜戦争の総括[M]. 東京:展転社,1995:13.
- [10] (日)山岡繁. 私の体験——侵略戦争の控訴する[J]. 新評,1971(9):55-63.
- [11] (日)寺島実郎. 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M]. 徐静波,沈中琦,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90.
- [12] (日)堀幸雄. 戦後の右翼勢力[M]. 東京:勁草書房,1983:70.

责任编辑 张颖超